

王元化著

清园近作集



文匯出版社

3

1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266616

C52

W4401

化著

涓園近作集



文匯出版社

7266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园近作集/王元化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4.8

ISBN 7-80676-605-7

I. 清... II. 王...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4087 号

清园近作集

作 者/王元化

特邀编辑/蓝 云

责任编辑/陈飞雪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120 千(插图 51 幅,彩图 2 幅)

印 张/1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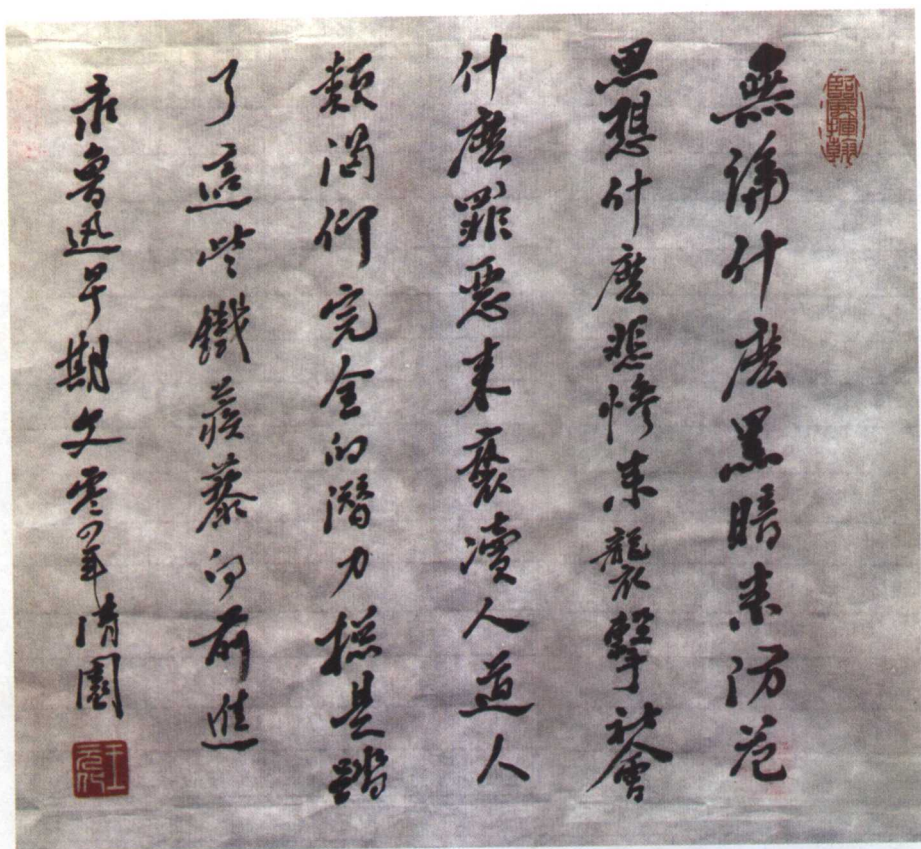
印 数/1—8000

ISBN 7-80676-605-7/G · 339

定价:25.00 元



作者近影



“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想，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褻瀆人道，人类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录鲁迅早期文 零四年 清园”

序

本书文字大多都写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也是第一次汇编成集。

随着千禧年的来临,我也迈入了老耄之年。满八十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化不大,还和从前一样,可以快步地行走,甚至还可以和年轻的朋友一起爬山。谁知一年不到,衰老就出现了。最初是过敏性皮炎,接着颈椎狭窄,老慢支、哮喘,以及前列腺病等接踵而来。记得年轻时从十力先生问学,他赠诗中有云“衰来停著述,祇此不无憾”。那时我不能领会。现在自己也进入老年,才深深感到十力先生诗句中说的那种遗憾实是一大苦恼。

人的一生真是时间苦短。当我开始懂事时,正是国家危难之秋。这十多年就在战争的烽火中度过。解放后,又是陷入了频仍的政治运动。等到我得以平反,转眼已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真正能从事自己所向往的工作,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九十年代一过,已没有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工作了。因此,现在能够奉献给读者的未收集的新作,只是这样一本薄薄的著作。

我是一个过渡时代的人物,自知不可能作出什么丰功伟

业。但我仍尾勉以赴是为了什么呢？我记得一位前哲作过这样的警示，不要“像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留下来的只是一排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应做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哪怕只是一点极微末的贡献也不要紧，只要是真诚地去做，锲而不舍地去做就行了。一个知识人主要应该在自己的知识领域内发挥作用，倘使知识者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那么，这方面的事谁去做呢？这并不是说因此就不去关怀人间事。鲁迅在抗战前夕说过，他能做的，“仍是运用自己手中这枝笔，它是五分钱买来的，名字叫做‘金不换’”，自然他也说过，当需要拿起别的武器时，他也会拿起别的武器。我一直以这话作为自己所信奉的良箴。

本书所发表的几篇对话录，其中一篇的对话者对我说：“可见先生身上十九世纪文化精神的熏习极深。我大胆地说一句，先生晚近的精神气质上恐怕更多回向五四前一辈人……，那时想的是如何昌明旧学，融化新知。想的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五四以后就不是那样了。”从本书目录可看出，有好几篇是涉及道德和传统的问题。其实这倒不是因为我近年来对这方面问题特别感到兴趣。倘深一层去看，我所关怀的是人文精神的急剧衰落，本书以《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置于卷首，笼罩其余各篇，命意即在此。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大多是从中国文化建设方面来考虑的。比如前些年，我写杜亚泉与东西方文化论战就是出于思想史方面的思考。我认为我在这篇文章中所

揭示的那些问题,正是长期来被我们现代史研究者所忽略、所误读的。又如,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剖析,也是针对我们长期以来只从一条路线,即社会契约论——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去理解西方启蒙学派的国家学说与民主理论,而对英国的经验主义、苏格兰的启蒙学派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则所知甚少,以致我们所形成的国家观念和民主观念,是极为片面的、偏狭的。再如,我写京剧与传统文化问题,也同样是出于我感到有一种需要,来阐明中国文化的特点,也同样是出于我对中国文化建设考虑,而并非由于个人兴趣和爱好。这种治学态度,出于怎样一种思想呢?我认为学术思想的价值,只存在于学术思想本身之中,学术研究必须提供充分的论据,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作出科学性的论断;而不能以游离学术之外的意图(哪怕是最美好的)、口号(哪怕是最革命的)、立场(哪怕是最先进的)这些东西来顶替充数。因此,我反对学术应依附于某种力量,或应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这类长期以来支配学术界的主流观念。我认为学术是有其独立自主性的,是有其自身价值的。

十多年前我曾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但是,这一观点并不被完全理解,有人以为我只埋头学术,也有人相反以为我在学术研究上不够专纯。无论是持前种或后种意见,都是同样的不同意学术的价值可以涵有政治的和社会的因素在内。我觉得上面说的两种观点,颇类似过去艺术论中所出

现过的两重价值论或两元标准说。三十年代初,日共理论家藏原惟人曾提出:一件艺术作品可区分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互相分离的两个方面。藏原这种观点是来源于苏联的拉普派,而拉普派据说又是根据普列汉诺夫的一种说法,即艺术作品中含有“社会等价物”。后来,我们这里提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亦与此说类似。我认为,目前对学术价值的认识偏差,大抵是延续了艺术作品的两重价值或两元标准的理论。记得四十年代在讨论艺术标准时,故友陈守梅因不赞成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说法,曾提出“艺术即政治”。这句话虽然说得笼统,但意思并不错。一篇艺术作品,它的思想力量,必须从艺术作品本身表现出来,而不能是外加给它的。所谓“外加”指作者离开艺术作品本身的特性去宣讲说教,比如作者借作品中的人物去说作者自己要说的话,而不是人物可能说的话等等。从事学术课题的研究是很复杂的,往往有学术方面的思考,也有思想方面的思考;有历史方面的思考,也有当代方面的思考;有文化方面的思考,也有政治方面的思考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研究者的头脑中。在从事不同课题的研究时,有时会从这一方面出发,连及到其他方面;有时也可能从那一方面出发,连及到其他方面。不论怎样千变万化,归根到底都是从学术本身引发出来的,而不是外加给学术的。正如上述文艺创作的情况一样。学术研究倘使没有充分的论据,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就不能作出科学性的论断,只能说是研究者的个人

独断或绝对命令。

友人林同奇说过一句令人叹息的话：“熟悉学术界争论的人都很容易发现争论双方往往得费很多口舌，来澄清对方对自己的误解。”我虽然多次不幸地陷入这种苦恼的境地，但我希望这本书的命运好一些，能得到读者怀着同情的理解，果然如此我将会感到十分欣慰。（本文由蓝云笔录我的口授，谨此致谢）

王元化

二〇〇四年五月

目 录

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	001
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	010
与德里达对话访谈录	023
传统资源:具体中的普遍性	035
生命、人文和政治文明	056
郭嵩焘与湖南新政	063
道德及其现代价值	069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略谈	078
关于京剧的即兴表演	083
读书札记(三则)	092
《无邪堂答问》摘抄	098
谈谈我的日记	118
谈谈回忆录	122
“以我为例”	129
《人和书》跋	133
关于《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的几句话	138

[附]史华慈遗笔:《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		
的一桩新鲜事》(史华慈)		142
史华慈遗笔导读(林毓生)		151
写给吴步鼎的七封信		159
[附]蔡达君写给吴步鼎的信		170
书简续编(二十四通)		172
致王春瑜/172	致沈建华/174	致书 书/176
致李 普/179	致任继愈/181	致邵燕祥/181
致王 焱/182	致张晓风/184	致刘 凌/185
致周正章/187	致李海青/190	致吴海勇/191
致邵东方/191	致许江(二通)/192	致唐 康/195
致陈冰夷/197	致陆 挺/199	致苏 烈/201
致林毓生(三通)/202	致杨少俊/207	致林同奇/209

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 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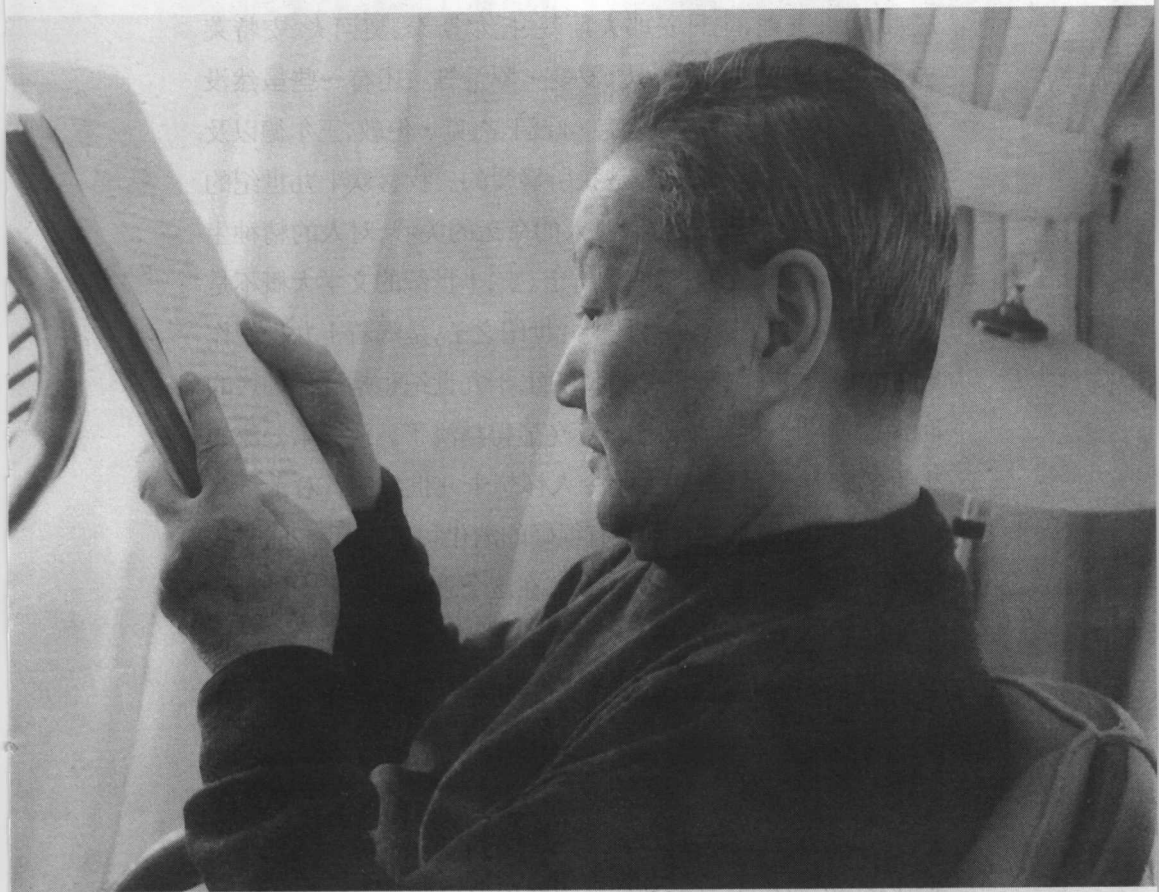
胡晓明问:在上海这样以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人们很容易听到大批公司人、企业人、政府人、金融人和专家的声音,但是却似乎很难听见“文艺复兴人”、“人文主义者”、“通人”、“思想者”的声音。像先生这样以人文为职志,以博雅为趣味,以思想关怀为宗旨的知识人,应该还是有相当多的听众的吧?

答:我不主张把知识人截然地判为几种人。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有没有公共的关怀。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人,我以为都应该有一种自觉其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声音。海外友人张灏在一篇谈及殷海光的文章中,讨论到由于分工的发展,知识人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只具有一种职业的操心,变成整个组织化社会中没有批判意识的“有机知识分子”。我很赞成张灏所说的知识分子要有公共关怀,公共的关怀可以是对身边事

的主动的知情和热心的参与,也可以是关于文明与发展、知识与文化等大的问题的省思。比如现在大家都说全球一体化,其实对文明的忧虑是十九世纪人文知识分子的老问题。从尼采以来就不断有一种呼吁。恐怕这一个世纪的主流仍然是科技文明的功利主导。我们正在看到文化和教育走向商场,大学也在企业化,知识人才走向规模化大批量生产。工商由效率重新组织、教师和知识分子成为普通雇员……人们的大多数活动和形形色色的个性,正在逐渐被科技和利润之手整合为一体,科技和利润的逻辑正在逐渐成为评估一切发展进步与落后的准绳……如果是这样的话,离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个性的充分伸展,确是还有相当远的路要走的。所以,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敏感,他们对文明发展的思考,是对人的自由命运的忧虑关心。这种关心和忧虑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是从不间断的,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世纪转换交替的时刻,越是显得鲜明强烈罢了。

问:从您的书中读到您特别喜欢十九世纪。作为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种种灾难,又面对世纪末的种种病象的过来人,您是否对二十世纪已经失望,甚至会有幻灭感?

答:我不否认我对十九世纪比对二十世纪有更多的感情。直到今天,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欢的读物。十九世纪文学,重要的我都读过。二十世纪的文学我读得很少。在我的著作中,谈的较多的除莎士比亚、菲尔丁等外,是狄更斯、勃朗



此照摄于二〇〇四年春。

二〇〇一年作者右眼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其后一年之内又患青光眼，虽及时医治，未见成效，致视力完全丧失，而左眼视力亦渐下降，从此只能倚赖友人“听读”一些书籍。在书写方面则更为困难，只得以口授、友人笔录的办法进行写作。他很不习惯这种方式，以至写一封信都需要更改数次。虽然如此，偶尔他也用尚能阅读的左眼核对文稿。照片捕捉了这一越来越难得的情景。

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安特莱夫、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罗曼·罗兰等。还有一些虽然没有在文章中谈到,比如像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王尔德以及一批诗人、戏剧家等,也都是我所喜爱的。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二十世纪的文学大概不是这样写的吧?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是喝着十九世纪作家的奶成长的。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十九世纪也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二十世纪的文学天空就不免显得黯淡了。缺乏第一流的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怎么不令人怀想十九世纪呢?对于十九世纪思想和学术遗产都没有很好的消化和吸收,我们的时代充满着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东西,在这个思想和观念变成走马灯的时代,我们容易看出十九世纪的好处,毕竟那是一个对思想和学术充满着虔敬之心和潜心耕耘的时代。

然而话又说回来,我不喜欢用过于概括化的语调来下判断,所以我没有想过“幻灭”之类。我喜欢从具体的文化问题下手作批评,而不是发表宏伟的概观。比如现在大学的巨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究竟是利是弊依然很值得研究。从前的校长往往是文理兼通的,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才了。在一些理工出生的校长眼中,文史哲是无用的。只重应用而放弃基础学科的培养已成为普遍倾向。至于对精深学问的探讨更是被忽视。目前学校中有许多人甚至完全不懂人文精神对人的素

质培养的重要。学校里科研课题的申请,也有功利化、浮躁化的倾向,而背后的导向是只注意量的扩张的形式主义(经济上有泡沫,教育有没有泡沫化的现象?我看是有的)等等。这些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将来的人由现在的教育来造就,教育的品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文化气质。所以人文精神在这里就有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人文知识者发出声音,就包括这些很基本的关心、基本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表达而已。人文知识分子比较能欣赏多元立场,比较多主张个性自由发展,所以总会有一些在功利、数字、规矩和巨模的压抑之下的不同声音。

问:记得殷海光说过:“一只加拿大狂欢鹤需有一百六十亩才能生存愉快。”的确,在科层组织化、市场至上、功利主导和工具理性占优势的社会,人们的精神自由空间是不那么大的,所以你说的多元立场和个性自由发展,作为人文知识人的基本诉求,作为本世纪人文思想的重要财富,在未来的世纪里会非常重要的。尽管你说你不喜欢作比较,我正是要说十九世纪的人似乎比二十世纪的人有更多自由的精神向度(Psychological Dimension),这里的关键是十九世纪人有一种文化上的“广漠之野”,而现在这种精神生存的背景渐渐消失了。你有没有发现,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你所喜欢的莎士比亚、契诃夫,那个时代的文学、诗歌、音乐、美术、哲学,这一切人文主义者奉为神明的优美事物交织而成的旧世界,正在走向边缘,破碎、消失?

答:什么是时代精神?什么是新陈代谢?在文学作品和文